

广东省僮族社会历史情况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印

1963年10月

說 明

根据1958年統計，广东省的僮族共有142,839人。其中以欽州僮族自治县为最集中，有112,267人（內欽州北部111,846人），占广东僮族总人口的78.5%强。其次，东兴各族自治县有17,295人；連山僮族瑶族自治县有9,436人；灵山县有3,931人。此外，怀集县尚有僮族1,600多人，1958年未統計在內。

这里介紹的主要是欽州、东兴和連山三个地区的僮族情况，其他地区的均未收入。欽州、东兴僮族的情况是1958年9—11月間由黄朝中、范楚玉、李宗一等同志調查和整理的。由于人力少，地区分散，時間匆促，除个别地区作了重点調查之外，其他的材料，特别是解放后部分，基本上是根据各級党委提供的資料整理而成的。此次付印的材料仍按照1958年調查的情况未作改动。

至于連山僮族的情况，曾由孙森、丁学云两同志作了一般的調查，此次未加整理付印；为了补充这部分的内容，特將連山县1962年調查的一份資料附录在这里（原文見《連山僮族瑶族自治县成立紀念特刊》）。

最后，这次付印的材料仍未作很好核對，只供有关方面作內部参考，并請批評指正！

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1963年10月

目 录

欽州僮族自治县僮族社会历史情况	(1)
一、一般情况	(1)
二、解放前的經濟情况	(3)
(一) 經濟概況	(3)
(二) 生产資料的占有和阶级关系	(4)
(三) 剝削方式	(5)
三、国民党的反动統治和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7)
(一) 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統治	(7)
(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8)
四、解放后的根本变化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成就	(11)
(一) 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	(11)
(二) 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13)
(三) 經濟建設的成就与人民生活的改善	(16)
(四)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19)
(五) 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1)
 东兴各族自治县僮族社会历史情况	(23)
一、一般情况	(23)
二、解放前的社会情况	(26)
(一) 經濟情况和阶级关系	(26)
(二) 政治情况和人民革命斗争	(29)
(三) 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	(32)
三、解放后的新面貌	(33)
(一) 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	(33)
(二)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	(34)
(三) 經濟建設的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37)
(四) 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41)
(五)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43)

連山僮族瑤族自治县僮族社会历史情况(附录).....(45)

一、地理与人口.....(45)

(一)地理环境.....(45)

(二)人口情况.....(45)

二、語言、历史和社会.....(46)

(一)語言.....(46)

(二)历史.....(46)

(三)家庭与社会.....(47)

(四)婚姻.....(48)

三、生活习俗.....(49)

(一)居住条件及其建筑物的演变.....(49)

(二)服飾.....(50)

(三)飲食.....(51)

(四)医药知識.....(51)

(五)僮歌.....(51)

(六)民間故事与传说.....(53)

(七)节日和崇拜.....(53)

(八)禁忌种种.....(54)

四、解放以来党的民族政策贯彻执行与各項建設事业的主要成就.....(55)

欽州僮族自治縣僮族社會歷史情況

一、一般情況

廣東省的僮族，主要聚居在欽州的北部，簡稱欽北。1958年曾在這個地區建立欽北僮族自治縣，包括大寺區15個鄉，貴台區10個鄉，長灘區14個鄉，王屋屯區12個鄉，小董區7個鄉，大直區18個鄉，灘營區7個鄉，大基區1個鄉共84個小鄉；共有10個較大的墟鎮，如大寺、大直、黃屋屯；其次是貴台、長灘、那蒙、新棠等。這份材料就是1958年按欽北僮族自治縣的範圍調查編寫的。

欽北地區的地勢是西北部、北部、東北部高，南部低，西北部橫臥着十萬大山及其餘脈，並成為與廣西的天然分界綫。北部有棠尖山、雷公岩、茶山；東部有岳山和古道嶺；中部有望海嶺。境內山嶺環繞，崗巒起伏，故大部分為山區及丘陵地區。境內的河流，最大的為大寺江，該江發源于馬篤山麓，從西北部流經貴台，橫過中部，經大寺鎮，再流向南部經黃屋屯到茅嶺江，最後流入貓尾海（龍門內港），全長91公里。其次，西部有大直、灘營江。大直江發源于黃崗山麓，灘營江發源于太平山麓，兩江流至那洞八角灣而匯合，再向南流到橋桶下與黃屋屯江匯合。再其次有長灘江，發源于靈山縣太平鄉；奇陵江起源于大塘花甲山，兩江均位于東北部，為大寺江的主要支流；長灘江流經長灘、小董，在竹園與奇陵江相匯合後，向西流再與大寺江匯合于鯉魚坪。此外，還有不少小溪流。

欽北地區地處亞熱帶，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達1,700—1,900毫米，但降雨量多集中于每年5—9月，10月到次年4月則少雨或無雨，故常出現春旱與秋旱，尤以東北部的長灘、新棠、那蒙較為嚴重。水土流失較重者為新棠鄉，次為那蒙、坭城鄉、黃屋屯、屯強、屯安等地，估計水土流失面積約11.05平方公里。

欽北地區雖然大部分是丘陵地帶和山區，交通運輸不及平原地帶便利；但由于山區地帶一般是由北向東伸展，部分地區可以隨着山地的形勢，由東向西進，不必跨越大山大河而筑公路，如由邕北公路上的小董，可以筑公路一直西進，經大寺至大直。水路交通有三條河流：一條是東通欽州小董，一條北通廣西上思，經貴台、大寺、黃屋屯；另一條從大直流過東興的茅嶺注入大海，都能通行帆船。歷來這幾條河都擔負着水路運輸的重担，對促進城鄉物資交流、繁榮市場經濟，起了很好作用。

欽北地區共有耕地面積約331,894畝，約占全部面積的30%左右，其餘70%為山地（其中20%左右為森林地帶，其他都是荒山荒地）。主要農作物是水稻，在33萬多畝耕地中，水稻占28萬多畝。耕地面積雖然不大，但由于水源較好，土質肥沃，一向是個高產糧區，特別是大直和大寺歷來有米倉之稱。此外還盛產扁柑、沙柑、沙梨、菠蘿、荔枝、龍眼等，西北部邊境的十萬大山，還有許多未開發的原始森林。地下蘊藏也很丰

富：經過最近几年的勘测，已发现的矿藏有錦、錳、水晶、鉄、鋅、金、煤、磷灰石、瑪瑙、石墨、水艮、方鉛、硫磺等；其中較多的是錳矿，质量也很好。

根据1958年統計，欽北地区共有人口185,568人，其中僮族111,846人，汉族73,500人，京族222人（詳見附表）。欽北地区的僮族大都与汉族杂居，但北部、西部及中部僮族居住較集中，如：洞利乡总人口5,180人，其中僮族5,935人，汉族230人，京族15人；南間乡总人口5,940人，其中僮族5,834人，汉族仅有26人；其他除大寺鎮、那天、黄屋屯、王崗山、滩营等乡汉族較僮族稍多外，一般乡都是僮族較汉族为多。僮族现在除了語言与汉族有差別外，其他飲食、居住、服飾、婚姻、节日等，都与汉族差不多。不过僮族較喜爱唱山歌；土改时，在靠近广西的貴台乡五宁村，还有小部分妇女包头和个别的“高栏屋”；解放前，婚姻关系主要是父母包办婚姻，“上門”（招贅）的亦有，贅婿有全部继承权。欽北地区僮族的語言属南僮方言系統，他們自己称之为“村話”，又分成三个方言区，即：垵城乡、貴台乡、大直乡、滩营乡、黄屋屯乡、屯安乡为一个方言区；新棠乡、长滩乡的一部分为一个方言区；南間乡、那蒙乡的一部分为一个方言区。絕大部分成年男女都懂“白話”（广州方言）。

关于这里僮族的历史来源，有几种說法：一說是祖先系山东白馬县人，因汉时随馬伏波远征交趾留住下来的；另一說是祖先从广西迁来的；还有一說是祖先从福建迁来的。这里的僮、汉族劳动人民有着悠久的血肉相联的密切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欽北地区的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胜利。

解放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欽北地区僮族人民也和汉族人民一样經過了各項运动，群众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积极努力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尤其是大跃进以来，欽北地区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逐步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

附 欽北地区僮族人口分布表

1958年4月

类别 乡别	总 户 数	总 人 数	男				女			
			小 计	僮 族	汉 族	京 族	小 计	僮 族	汉 族	京 族
总 计	46750	185568	105920	64234	41685	1	79648	47612	31815	221
屯 显	1699	7231	4136	2393	1243		3095	1812	1284	19
上 汶	2531	10684	5605	3908	1697		5079	3213	1866	
那 天	2698	10340	5794	2294	3500		4546	1629	2898	19
黄屋屯	2664	11281	6409	2871	3538		4872	1940	2877	53
太 平	727	3286	2002	1293	709		1264	689	564	11
王岗山	2112	8779	5452	2333	3119		3327	1309	1923	14
滩 营	2423	10945	6390	3154	3236		4555	2155	2400	
大 直	2133	13550	8002	5104	2898		5548	3560	1960	23
屯 安	2175	8516	4787	3743	1043	1	5729	2917	784	28
屯 强	4363	15700	9158	7513	1645		6542	5137	1372	13
洞 利	1808	6180	3319	3160	159		2361	2775	71	15
黄 台	2824	9870	5217	4073	1144		4653	3773	863	17
南 间	1673	5940	3421	3418	3		2519	2469	23	
那 蒙	3390	15573	8983	4818	4165		6330	3162	3128	
长 滩	4113	15611	9003	99	8909		6603	281	6322	
新 棠	2734	11742	6730	4972	1758		5012	3330	1382	
附 城	4546	17648	9805	8236	1569		7843	6783	1056	2
大寺镇	541	2712	1702	322	1380		1010	248	762	

注：京族妇女是由东兴及越南地区嫁来的。

二、解放前的经济情况

(一) 经济概况

钦北地区虽然地处山区和丘陵地带，耕地面积仅占总面积30%，但大部分是双造水田，解放前95%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都是个体小农经济，主要农作物是稻谷；其次有少量玉米、黄粟、三角麦等；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芝麻、黄麻、苧麻、柑类、芭蕉、桑等，亚热带植物不少，除一部分自然林外，大部分经济林都是人工栽植的。

欽北地区早已有了一些小型交換市場，在大直、大寺、貴台、黃屋屯、長灘等墟鎮，都有不少小座商，經營付食、雜貨、日用百貨等。此外，在墟鎮三天有一墟集，農民運自己的農付產品到市場交易，換回生產工具和生活必需品。由於土地占有的不平衡，30%以上的少地和无地的破產農民就作小商販運鹽販米到廣西去，以博蠅頭之利來維持生活。手工業不發達，除墟鎮有一些農具製造、木材加工、磚窑瓦廠等外，農村中大都和農業密切結合在一起。

山區經濟，因受自然條件限制，需要輸出自己的土特產換回鹽、布等生活必需品和生產資料，因此欽北僮族地區的經濟和漢族地區經濟有着長久的密切聯繫。正由於這種長期的經濟文化交流，僮族地區的農業生產，在解放前基本上已達到了鄰近漢族農業生產的水平，生產工具、生產技術、作物種類，都和鄰近地區漢族差不多，唯一較有些區別的，是此地木耙很多，據說是因取材較易而且這種木耙製作和使用也較方便的緣故。農業上男女分工較明顯，如男子犁田、耙田不插秧，女子插秧而不作犁田耙田工作。僮族勞動人民，在某些耕作技術方面，甚至超過鄰近漢族，如欽州不少漢族，在解放前種植稻穀時採用撒種，而僮族早已採用插秧。一些在山麓上的稻田，就用夾糞點種的辦法種植，其產量比雙造水田的一造還高。

僮族勞動人民，長期受着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統治，加上各種自然災害的襲擊，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農業生產量長期不能提高，直到解放前每畝水稻平均產量只有200斤左右；就是在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的大直區和大寺區，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一樣缺糧，山區缺糧更厲害，如洞利中農約有50%每年缺糧3—4個月，貧農缺糧達7—8個月。運胎社各村，解放前50%人家一年幾乎沒有米吃，25%人家只够半年糧，勞動人民多以稀粥野菜糊口。

(二) 生產資料的占有和階級關係

據解放後土改時調查，欽北地區共有貧雇農33,610戶，中農8,458戶，富農1,270戶，地主1,346戶，其他成份2,063戶。耕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大部分為地主、富農所占有，剝削階級利用其生產資料和政治勢力，對勞動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土地不斷集中，出現了不少大地主。如長灘鄉的陸炳達，黃屋屯鄉的曾鑑和貴台鄉的梁子清，每年收租都達一萬斗稻穀。有些鄉，地主占有全鄉耕地80%以上，如敦民鄉82%的土地為地主占有，每年只地租剝削就有644,000斤，因此，全鄉有31%的貧苦農民，在農閑季節被迫遠離家鄉當小販，挑鹽販米來解決荒月困難。屯顯鄉全鄉552戶，地主26戶、富農13戶、中農151戶、貧農184戶、雇農79戶、貧民56戶，其他成份43戶。在26戶地主中，有3戶每年收租7,000余斗谷，有3戶每年收租2,000—5,000斗谷，有2戶每年收租1,000—2,000斗谷，有5戶每年收租500—1,000斗谷，有13戶每年收租100—500斗谷。

在山區，土地占有也很懸殊，如洞利農業社各個村莊，解放前共有447戶，1,557人，耕地面積2,474畝，其中地主5戶（40人）占774畝；富農14戶（60人）占258畝，中農43戶（179人）占約1,000畝；貧雇農385戶（1,278人），只占500畝左右。從以上占有情況可以看出，占戶數4.2%的地主富農占有40%的土地，而且多是好的稻田。占人口

极大多数的贫雇农，则占有极少量土地，因此广大劳动农民只好另寻生路，如挑盐过活、作小贩、到外地当长工等。

欽北地区不仅土地集中，生产工具和耕畜，也多为地主富农所掌握。茲根据貴台区土改时的材料列表如下：

貴台区各阶级占有主要农具、耕牛、房屋情况统计表 1958年10月

阶 层	項 目	戶 数	人 口	土 改 前 占 有			
				犁 (件)	耙 (件)	耕牛 (头)	房屋 (間)
雇	农	360	1,136	61	56	54½	309
贫	农	1,839	7,068	994	1,006	1,143½	2,261½
中	农	730	8,149	717	700	867	1,209
富	农	174	756	191	184	368½	346
地	主	176	744	206	331	198	432½
小	土地出租者	87	205	9	9	13	123
小	販	48	145	1			8
贫	民	59	204	1	13	1	54
游	民	17	31				14
小	手工业者	43	125				
工	人	38	100	3	2	2½	21

(三) 剝削方式

①出租土地：租佃人必須用土地、房屋、耕牛等财产作抵押，如无财产，必須找有财产的人担保，否則租不到土地。在承租时得先給地主一些“水面錢”，地租一般是粮食产量的60%，每年交租时还要送給地主一只鸡，称为“田头鸡”。所以实际地租往往达70%左右。有些地主在出租土地时规定“死租”，如好田一般每亩300斤租，一般田地每亩200斤租，不管年景好坏，地租必須按数交納。因而农民常常是一年辛劳，到头一场空，如貴台乡运胎村黄如桂，在1944年租了地主黄朝松二块坡地种甘蔗，规定地租25斤糖，但当年甘蔗刚好只出了25斤糖，全部交給了地主；他退佃时，地主还强迫他把地里蔗头挖干淨，否則要抓他去坐牢……。又同村黄登朝，年終交租时，无錢买“田头鸡”，地主就把他家中准备过年吃的3斤猪肉搶走。到期交不出租来，除沒收抵押品外，地主还想出另一个办法来榨取农民，即所謂“补旧租”。如屯南乡貧农李汉高，租种地主的300斗种田，一年交不上租便被脫耕100斗，其余200斗田生产所获全部归地主；一年后又脫耕100斗，1936年又脫耕50斗，补交旧租达五、六年，到交清后，就全部脫耕，白替地主耕田；在这五、六年內，一家人則依靠摸蜆及編竹器等維持生活。地主还

随意地加租，屯南乡贫农馮承海，1929年租种地主馮国賢85斗租田，到1939年十年間，便增加到210斗租。此外地主有时还强迫佃戶作无偿劳动，如在收获季节，給地主搶收稻谷，婚喪事时，叫佃戶出劳动力等。

②高利盘剥：有“花利谷”和“放壩利”等几种。借錢要用田契、房契等作抵押，逾期不还，則沒收抵押品。借谷的較多，也要抵押。年利70%較普遍。借谷一般是一斗还1.6斗—1.8斗，四月荒时借一斗还兩斗（一般貧苦农民多在四月荒借谷），借谷种一斗还2—3斗。地主在荒年岁月，乘人之危，高利貸利率竟达月利100%，使許多人因借債而傾家蕩产。如貧农王汝川原有八亩地，在1945年向地主借債，年利100%，一年一翻，利上加利，到1947年就把八亩田全部卖完还債。远胎村陈志明和黃仍玉都曾因借高利貸还不了，被逼出賣儿女給地主作婢女。据屯南乡1952年土改时調查：全乡706戶，放債的83戶，其中地主7戶（占8%），但地主所放总債額占全总債額的35.6%。全乡借債的268戶，其中貧雇农116戶，占全乡借債戶的44%，所借債額占全乡总債額的42%。

广大劳动人民因生活困难，往往不能按时还債，不少地主就雇佃流氓地痞催債。屯南乡地主还和伪法院勾結，在院內設有“广德稅”，專門替地主催租催債，收入所得，二成归法院，八成归地主。

③雇工：长工每年工資一般18—20斗谷，最少的只4斗，最多不过30斗。短工每月2.5—3斗。童工放牛，一年只給一套衣服。害病不能做工要扣谷。东扣西扣，有些长工，到年终工錢就被扣光。还有些地主极端狡猾，当长工作了半年工时，他就百般刁难辱罵，迫使长工离去，不付工錢，无偿地剝削雇工的半年劳动。

④超經濟剝削：地主富农階級依靠政治势力橫行霸道，巧取豪夺，榨取人民血汗，无所不为。不少地主本身就是伪乡保甲长，他們假公济私，貪污中飽，花样百出，如私加捐稅等，尤以假借征兵为名进行詭詐更为严重，使許多人家破人亡。如远胎全村，被征兵16人，全是貧苦农民。其中有8人是以征兵为名，实际勒索，連被征3次的一人，2次的2人，一次的13人；李生玉在两年內就被征三次，第一次被迫給伪村长60斗谷才免征，10个月后被伪乡长苏桂龙指令当兵，又被勒索80斗谷；隔一年，又因征兵被捉到貴台押了几天，被迫用120斗谷請人代征。洞利乡有一家貧苦农民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因被征兵，財產蕩然，全家星散。此外霸占財產、强迫收买也不少。如貴台大地主梁子清，为使自己的土地連成一片，就强迫农民卖田給他，如果不卖，就設法陷害，甚至杀死。太蒙村恶霸地主黃香标，他1938年开始作洞利乡伪乡长时，才仅几斗谷种田，到1943年，就聚斂了70多斗种田。在职期間，大肆貪污公款，經常探察群众，见到誰家有錢，就叫誰（或其子）当兵，如不应征，就要給他160斗谷或15,000枚銅錢。如黃香芹养有一只大猪，生活稍好，黃香标知道后，就令其当兵，被迫給了黃香标8,000枚銅錢才免征；不久，又叫黃香芹当兵，又被勒索12,000枚銅錢，直到破产为止。他还无偿地役使农民为他耕田，佃戶年終送給他的“田头鸡”必須是肥的，否則就加倍詭詐。

地主发家，除了以上的方式之外，不少地主还用開設賭局、販运烟土、勾結土匪搶劫，以攫取大量財富。在这样殘暴的掠夺下，人民生活自然极端困苦。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僥族内部的剝削十分严重，階級对立也十分尖銳，处于水深火热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統治階級恨之入骨，因而时起反抗。

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 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僮族人民的反抗，在僮族地区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反动统治机构，每个乡设正、付伪乡长，乡长又兼民团大队长；乡下设保，几个自然村组成一保，设伪保长；保下设甲，有伪甲长。

这些伪乡村政权的统治者，是国民党的忠实爪牙，为反动政权征兵抓夫；征粮派款，强收苛捐杂税等等。单以苛捐杂税一项来说，就有十数种名目，如人头税、自卫捐、户口税、门牌税、保甲长办公费等等，不胜枚举。同时，伪乡长、保长、甲长，大都是僮族内部的地主、恶霸、富农等剥削阶级，他们握有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大权，借政治势力讹诈勒索，贪污中饱，无恶不作。如远胎村伪保长（姓名不详）1938年以建学校为名，每一斗谷种地收四斗谷，共收几百担，全被他吞没；有的因贫穷交不出就被抓到黄台坐牢。那略村伪保长黄北桥（富农），依仗反动势力，在地方上横行霸道，统治那略乡一带，1946年后，他带领国民党保安六团及伪自卫队，扫荡我革命游击队，烧革命村庄，杀革命群众，1949年被我游击队打死后，其同村黄仙猷继任保长，同样作恶，强拆民房修炮楼……等。伪乡长韦雨庄出入大寺镇都有几个狗腿作保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被其污辱的妇女达一百以上，是地方上的一条恶棍。国民党的反动党团组织，在僮族地区也普遍建立，许多乡都有国民党 and 三青团的组织，乡设区分部，地主任任分部书记，这些反动人物，握有对人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如屯南乡大地主吴斗南，便是国民党区分部及三青团分部领导人兼“红帮”头子，惯用妓馆、赌博、贩枪等形式扩大其组织，他有枪百余枝，除经常豢养保镖十余人武装警卫外，并得到反动政府的信任，能随时指挥使用伪自卫队、保安队、乡队、保安团及军官队等反动武装。另一地主任黄屋屯区公安局长时，为谋夺黄玉梅等三个农民的山林，而随便加上“窝匪”的罪名，将黄玉梅抓去杀掉。

1944年，这里一部分村庄也被日寇占领，到处烧杀抢掠，如1944年1月4日，日寇包围那岭村，不论男女老少一律遭到残害，共杀129人，杀完之后，又放火烧房屋、抢掠一空。

在这种残酷统治下，人民生活悲惨万状。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与敌人展开了武装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想用血腥的屠杀恐怖政策，镇压人民的反抗，消灭人民的武装力量，自1945~1949年，前后有广东钦州、防城、广西上思、邕宁等地反动军队伪保安第六团、七团、九团和伪军官队等，在张瑞贵等军阀官僚指挥下，勾结反动地主恶霸，向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抢光、烧光、杀光“三光政策”，使许多僮族村庄，成为瓦砾废墟，田园荒蕪，人民流离失所，满目凄凉。例如：那天乡那个村

原是一个15戶(120人)的僮族村庄,由于靠近大山,又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生活很苦,一般的农民都是靠耕田、打柴、鋸板,开荒种植过活,1947年革命游击队到达該村,由于农民們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痛苦,所以都紛紛支援革命斗争(送粮、送情报等),因此1949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勾結地主恶霸曾明光、曾定光,带伪保安第七团进行了三次扫蕩。解放后,据該村調查,全村被烧房屋54間,达全村房屋总数100%,一次烧毁稻谷69斗,搶去大米60斤、棉被三张,蚊帳7张,打碎鍋11个,水缸9只,搶走耕牛27头,衣服物件全被烧光搶光,使該村农民无法为生,东奔西逃,有些跑到广西公正、崇左、上思等地謀生,村里絕大部分土地丢荒。一些不能逃走的老人有的活活餓死,到解放后該村群众才从各地归来,重建家园。

大塘村有八戶(共32人)是革命活动的根据地,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該村进行扫蕩,把牛猪鸡鴨及物資全部劫光,在該村大吃大喝五天后,便放火烧毀房屋,并把搬不走的粮食等全部烧光,才回洞利墟据守,后匪軍见該村尚有房屋未烧毀,第二次到村中放火,并把未倒崩的牆壁都推倒,把未破碎的砖瓦全部打碎,一片不留,直到把全村鏟平为止。

米敏、六合、板六等三村,全部被烧光、搶光,牆壁都被搞平,变为一片荒地。由于国民党的扫蕩,使許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到处逃亡。国民党又施用阴谋,进行屠杀掠夺。如1947年貴台乡那晓村,人民因不堪迫害紛紛搬走,国民党就派匪軍到該村假惺惺地劝說群众不要搬走,并在大門写上保証不搶不杀,不少群众受騙回家居住,等群众大都搬回后,国民党就派匪軍对該村进行了大洗劫,凡能食的东西都吃光,能担走的就担走,耕牛、猪、鸡、鴨等劫掠一空,凡不能带走的物資和房屋又放火烧掉,并开枪追打救火的群众,終把該村50多戶房屋烧平。当时国民党的乡长曾命令其匪軍,见什么烧什么,见什么杀什么,“就是见到一条狗都要杀”。

在这样黑暗恐怖的时代,广大僮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們更坚决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一直到1949年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統治。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汉族和僮族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敌人作了艰苦的武装斗争,創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欽州僮族人民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頁。

1940年左右,粤桂边区区委领导下的十万山区地委,派了一部分干部到欽州小董鎮一带进行地下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的組織,革命思想影响逐渐扩大。

1945年1月,党在小董鎮組織了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小学教师、学生、农民共一百多人,起义后数日,就轉入欽州和广西上思交界的馬篤山一带,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当地僮族貧苦农民紛紛参加革命队伍。不久,革命队伍逐渐扩大。在党的指示下,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第三支队二十一团,下編有三个营和五个地方大队。

这支由汉、僮族人民组成的革命队伍，就在钦州北部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这支革命队伍，发展很快，1945年不过是百余人，所活动的地区，亦不过50余个村庄，但1946年则发展到600多人，活动的地区，达101个村庄。到1947—1948年，革命队伍已发展成为一个团，活动地区发展到整个钦北地区，主要地点是在大寺、敦民、那桑、大直、安木、那晓、贵台、洞利等地。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现将革命活动的简单经过叙述如下：

1943年以前，即有共产党员在洞利小学当教员，暗中对青年学生进行了一些革命的宣传教育，不少青壮年受到影响。1938—1943年贵台乡伪乡长黄香标统治洞利，农民被他残酷榨取，对他恨之入骨，遂于1943年旧历8月13日起反抗，杀死黄香标，在洞利墟的墙上写着“为民除害”“肃清贪官污吏”等标语。这反映了当地人民迫切要求推翻旧政权，争取自由解放的愿望。

1945年1月，有一部分同志组织了“小董起义”，后来把队伍转移到山区，在洞利、那天一带，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45年冬，革命游击队的一部“南解老一团”，由遂溪一带来到钦北地区，在贵台墟住了5天，对广大群众宣传了革命的道理，并逮捕了伪乡政府征收员，没收了伪乡长的财产，在贵台墟写了许多标语，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拉丁、不拉夫”等。因此“南解老一团”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在贵台、洞利一带又一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南解老一团”领导，决定留一些同志在本地搞游击活动，经过发动宣传教育，有20多个贫苦群众参加了革命队伍，组成了一支游击队。

1947年，21团以洞利乡为中心，建立了根据地，使国民党反动派很为恐慌，那天乡伪乡长悬赏要捉21团领导同志。在群众的帮助下，21团完全掌握了敌情，就将计就计，智取那天乡伪乡政府，活捉了伪乡长和11个伪保长，缴获机枪一挺，步枪30支。这次“那天事件”给国民党乡村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大大鼓舞了人民革命的热情，革命进一步发展。大塘、洞利、那路、那色、那个等村的青年，纷纷参加革命，组成“人民翻身大队”，发展到百多人。1947年4月，在洞利乡大塘村附近的山上，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了农会，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三征（征粮、征税、征兵），有些村庄成立了民兵组织，人民革命形成高潮，游击队发展到800多人。

国民党反动派看到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就想用血腥的屠杀办法镇压革命，调兵遣将，成立所谓“粤桂边剿匪指挥部”，调动伪保安1、2、6、8等4个团向根据地进攻。革命队伍和根据地的革命人民，团结一致，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947年6月，钦州国民党保安6团和南宁的国民党部队共2,000多人，两路包围了我革命根据地——洞利，当时游击队只800人，与国民党匪军进行了三天三夜激战，许多群众给游击队送情报、送水、送饭、送子弹等……。这次战斗共击毙敌军23人，击伤伪排长一人，缴获驳壳枪一支，七九枪两支。到第三天晚上，因缺乏子弹，游击队就撤退到八角山，敌人继续以强大兵力包围八角山，我游击队再次突围退入广西省上思县境大平山一带。经过几次激烈战斗，我革命队伍受到一定损失，再加上当时国民党为切断我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强迫参加革命的家庭叫自己的家

人回来“自新”，强行所谓“五家连保”等一系列的反革命措施，革命一时转入低潮。但反动派割断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企图并未得逞，人民仍然暗中支持我游击队，如游击队在八角山突围后经过高丽村，群众把400多斤芋头送给我游击队作粮食。

当时革命队伍是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三支队’”领导，游击队就是三支队属下的21团。游击队撤退到广西省公正一带后，就和当地的革命队伍汇合，声势壮大，接连攻占了14个墟镇，连战连捷，游击队由3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革命队伍又重新回到洞利一带活动，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8年8月，国民党又调动了大批匪军向我革命根据地大规模地进攻。鉴于敌人力量过大，革命队伍就化整为零，把队伍分散到各地采取“伏击”和“袭击”的战术，以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当时有300多人从洞利乡高丽村出发，经过小董，打到灵山县境，一路上与敌人作战27次，我游击队仗仗获胜。到达灵山县后，我游击队又决定远征，打到钦州龙门港时，遇到了几十艘伪军船截击，我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就决定由企沙转回十万山区活动。

当游击队回到洞利一带时，国民党匪军已盘据在贵台、洞利一带，在墟镇上住有匪军，镇压人民的革命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情况下，广大劳动人民，仍然积极支持革命队伍，如1948年农历11月18日，那略村群众知道了这天晚上有国民党匪军到米勒村一带去，就急忙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我游击队，游击队当晚伏击匪军，结果8个匪军被打死了3个，缴获六五枪4支，双筒2支，湖北单枪2支，子弹300多发。由于游击队取得了人民支持，革命队伍又逐渐壮大起来。

1949年2月间，我游击队由东兴经江平、竹山势如破竹地一路打回十万山区，声势浩大。5月，广西省邕宁县伪民团付司令亲自率领伪保安六团向我革命根据地新塘一带进攻，一路烧杀抢掠，广大被害群众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我游击队作战。伪民团付司令被击毙，匪军也都逃回广西，我游击队得到了很大胜利。

1949年秋，我解放大军到达钦州，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武装，游击队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了贵台、洞利一带，在反动派黑暗统治下的广大人民获得了解放。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配合和迎接全国解放的光荣任务。

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年月里，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持革命斗争，和游击队同甘共苦，坚持了数年游击战争，数以千计的劳动人民优秀儿女参加了革命队伍，许多劳动人民千方百计地给游击队送粮食、盐、油、布等日用必需品，代买枪支和子弹，传送情报，不怕危险，不怕牺牲，不少人为了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支援革命游击队的斗争中，也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例如：

富雄乡那丽村梁二媽，是80岁的老太太，靠其孙子渡日，生活非常困苦。1944年，他的孙子梁富雄参加革命队伍，她不但没有反对，从此也积极支持革命，她对待游击队员就象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经常招待游击队员住宿，掩护革命领导同志，每次队伍到她家，她便给队伍做饭。游击队员到她家就象回到自己家一样得到老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敌人扫荡时，我游击队缺乏粮食，她就将祖遗的二斗种田卖掉，换回粮食，送给我革命队伍。1947年，梁二媽因支持革命被国民党匪军抄家，农具，烂被、蚊帐等一切用具，全被抢光，她并没有被匪军的残暴吓倒，仍然积极的支援革命。1948年，梁富雄

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队伍突围光荣牺牲（解放后，人民政府为纪念梁富雄烈士将他的家乡——原大东乡改为富雄乡）。梁二媽在她的孙子牺牲后得到了革命队伍的照顾和安慰，更加积极，经常代游击队张贴标语、送情报、代买杂物，一直到1949年革命胜利。解放后，这位使人敬爱的革命老人，得到党的关怀照顾，过着幸福的晚年。

洞利乡水街戴十六孀，经常送粮和油盐给我游击队，后被敌人发觉，捉去拷打，但她在严刑拷问下没有泄露一点革命秘密，敌人无可奈何，就释放了她。被释放后仍然担粮食支援革命，又第二次被捕，敌人强迫她带路到八角山找我游击队，她就有意地将敌人带到我游击队哨兵看到的地方，敌人到八角山没有找到游击队，回来后戴十六孀就光荣地就义了，为了支援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那路村凌美益，曾数次送粮给革命队伍，并把家中的一条牛送给队伍作菜吃，又把家里一斗种田卖掉，换回55斗谷，大部分担给游击队。由于他支持革命，不断地受到反动派的迫害，1947年夫妻俩人都上山参加了革命。

大塘村黄煥才，1945年我游击队员三人作战负伤，他就与黄廷升在夜里穿过荆棘丛生的荒山，将伤员抬回，并盖了一间隐藏伤员的茅屋，医药和生活完全由他照顾，一直到伤员同志痊愈，重返革命队伍。1947年我游击队智取那天伪乡政府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好，只是缺少印油，当时黄煥才就冒生命危险，到国民党匪军盘据的洞利买印油，并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他还经常给游击队送粮食、带路等。如1948年我游击队30多人被国民党包围，他就带领我游击队员夜间由小路安全突围。

象以上这些人一样坚决支持革命的还很多，如周七媽、黄志保等等。革命队伍由于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地发展壮大。这里的人们说：“洞利山区的游击队和群众，就好象江中的鱼和水一样”。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游击队与人民之间血肉的联系。

解放后，老根据地的僮族和汉族劳动人民，继续发扬了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光荣革命传统，在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四、解放后的根本变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

钦州僮族人民长期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为了争取自己的解放和汉族人民一起，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的10月迎接和配合了全国人民解放大军的南下，解放了整个钦州，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愿望。

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一些革命老根据地的村庄，曾建立过各种群众组织和革命人民政权，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并通过这些组织来支援革命、扩大队伍、打击敌人，起了很大作用。虽然反动派不断摧残破坏，但很多都能坚持下来，并进行秘密活动，展开对敌斗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到了一九四八年尤其是一九四九年，革命力量所到的

地区，各级基层人民政权组织，又纷纷地建立了起来，所以当解放大军南下之际，就能从各方面取得密切配合，积极支援，为解放全钦州创造有利的条件。然而，这毕竟还是局部性的，并且受着很大的限制，不能全部行使人民的权力。直至全面解放，在党的领导下，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才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人民政权组织，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机器，人民才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它的爪牙以及一切反动残余势力，并不甘心于自己的死亡，当着人民政权还未彻底巩固的时候，这些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又纷纷纠合起来进行武装暴乱，企图从新夺取人民的政权，恢复他们的反动统治，因此，从一九五〇年初开始，钦州整个地区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又激烈地展开了。这个时期，我们的地方革命武装，正在进行休整，而反动的匪徒，就开始进行反扑，集结了所有的反革命残余，并乘社会秩序还未完全稳定的机会，诱惑了一部分落后群众，作为他们的工具。匪徒号称万众，气焰非常嚣张，公开袭击我们的区乡政权，包围我们的村庄，封锁我们的交通线，残杀我们的革命干部，这是一场严重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也是对这里各族人民的一次严重的革命考验。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僮、汉族人民，不仅不为反革命匪徒的势力所慑服，而绝大部分都为巩固自己的人民政权和革命胜利果实而英勇地奋战。如敦民村坚持了75昼夜的顽强斗争。长滩乡乡长杨立基（僮族，共产党员）坚持到最后一粒子弹而光荣牺牲。又如匪徒围攻贵台乡那邕时，前后4次冲锋均为我民兵所击败，并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足足坚持了10天，争取时间等待大军的到来。这些英勇事迹各地都有，这是在长期革命锻炼和影响下的结晶。

在全国人民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反动残余势力居然如此猖狂，主要是由于官僚、地主、伪军官、伪乡、保、甲长等反动统治阶级不甘自己的失败；同时，由于刚刚解放，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还没来得及彻底摧毁，如贵台反动军阀张瑞贵，大寺恶霸地主朱三少（绰号），长滩乡杨济洪、杨茂培，新塘乡黄有泽等，一向在这些地区称王称霸，培植不少爪牙；加上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还留下一些残匪，于是他们就互相勾结起来坚决与人民为敌，他们幻想着当时越南还没有解放、海南岛还没有解放，而且地接十万大山，进攻退走都有余地，满以为尚有一番作为。但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人民的天下是不容许这一小撮残匪为非作恶的。1950年秋后，解放大军在党的指示下，即与地方部队配合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在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下，仅二、三个月就把大股的土匪基本肃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据钦县全县不完全统计，前后共毙伤匪伪八百余人，其中团级以上的有十余人，俘虏五千余人，其中营级以上的有四十余人；自新的三千余人，其中营级以上的有五十余人，连、排级一百七十余人，给予匪敌以沉重的打击，为人民的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在大股匪敌被肃清之后，接着于1951年初即开展八字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一九五二年开展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摧毁反动残余的社会基础，巩固人民的革命政权。经过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运动，广大人民对党的认识普遍提高，对人民自己的政权更加热爱，如大张旗鼓展开抗美援朝宣传运动时，各地僮、汉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担负保家卫国的任务。清匪反霸时，不少为匪敌蒙骗的群众纷纷报上当，进一步打击分化和孤立了敌人，清除了一批匪霸分子。这里的匪霸是相当突出的，如大寺区有17个恶霸，其中匪霸就占15人；贵台

区有27个恶霸，其中匪霸就占25人。从整个欽县計，共有恶霸 895 人，其中匪霸就約占 85%（以上均不完全统计）。把这些反动残余势力打掉，就保证了人民的彻底翻身，因此广大群众都非常高兴，从内心深处来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减租退押时，更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到处鑼鼓喧天，庆祝自己的胜利。经过土地改革，土地还了老家，迅速转入生产，就出现了一幅全新的面貌，从此人民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社会秩序也获得了空前的稳定。在这个基础上，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一直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

解放以后，由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胜利完成，欽北地区的僮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根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8年5月7日在欽北地区建立了欽北僮族自治县，人民公社化后并入了欽县，最近經国务院批准成立欽州僮族自治县。

解放几年来，各级党委对于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提拔非常重视，除选任了一批具有革命斗争经验和革命锻炼的僮族干部作为各部门的领导骨干外，并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在农村中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并吸收了不少在各个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为党、团员，农村党支部乡乡都有，团支部则村村都有，这对于党的方针任务的贯彻和完成有了很好的保证。

（二）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我国农村生产力长期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而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一般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因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然后引导他们逐步走向集体化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方针。欽北地区，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也相当突出，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那桑村每年收租在一千斗（每斗等于20斤）以上的地主就有5户，每年收租在五百斗以上一千斗以下的也有5户，每年收租五百斗以上的有28户，其中韦锡禄婆一户，每年收租就达6500斗，农耀辉每年收租也达5000斗。那横村更为突出，在9户地主中，仅梁子清一户每年收租就达11,500斗，而30%的农民却因无土地须靠做小販担盐为生。洞利乡解放前50%的中农都要缺三、四个月的粮，贫农一般要缺七、八个月的粮。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

解放后，经过平定匪乱，开展“八字运动”，抗美援朝以及一系列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群众觉悟一天天提高，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在上級党委指示下，欽北地区在当时欽县党委的领导下，在小董、那桃等地开展土改试点取得经验后，就于1952年上半年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打垮了封建势力，使广大农民真正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土改开始声势非常浩大，许多贫苦农民都坚决起来和地主阶级作面对面的斗争。到下半年，土改运动（复查）就胜利结束了，并在复查运动中对地主阶级作再一次的清算，从根本上消灭了几千年来统治中国人民的封建地主阶级，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